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現代中國的戰爭、政治與外交」工作坊介紹

侯嘉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近現代東亞歷史研究中，戰爭衝突以及與此緊密交織的政治、外交、經濟，乃至社會變化，是研究者十分關注的焦點，更是理解當代東亞世界的基礎。自去年（2016）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蔣介石研究群、胡適研究群，以及由近史所研究員黃自進主持，獲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支持的「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省思」研究計畫，與近史所研究員潘光哲共同倡導，成立了以青年學者為主要成員的「現代中國的戰爭、政治與外交」工作坊，自該年6月迄今已舉辦4次討論會，發表論文16篇，是國內抗戰史研究重要的交流平臺，值得向各界介紹。

「現代中國的戰爭、政治與外交」工作坊運作的1年來，分別在2016年6月18日舉行第一次討論會、9月24日第二次，以及今年（2017）的1月8日第三次和3月18日第四次等會議，完成第一輪的報告。有別於其他工作坊或研討會的進行方式，黃自進特別指出希望藉由密集且常態性的共同討論，且積極邀請專家學者評論，期待共同交織出抗戰史或近代東亞史研究的新火花。為了更能充分交流，每次討論會僅安排4篇論文發表，每位報告人可報告40分鐘，從容說明研究構想；評論與自由討論也各安排20分鐘，有足夠的互動時間。此外，工作坊另一個重要特色是以青年學者為主，目前16位發表人中包括9位取得學位5年內的年輕研究者，以及7位已確立研究

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所以通過工作坊的議題討論，亦可窺見未來抗戰史研究的趨勢與可能。

目前工作坊已發表的 16 篇論文中，大體上可以分為 4 個方向，包括「戰爭戰役史」、「戰爭與科技知識」、「戰爭與政治」，以及「戰爭與社會」等主題，不難看到戰爭衝突實與近現代中國國家發展有密切關係，也深刻影響當代社會樣貌。戰是之故，重探中日戰爭時期種種議題，可說是理解當前東亞歷史與現狀的重要基礎。以下即分別由前述 4 個方向，分別介紹一年來報告與討論內容。

一、戰爭戰役史研究

首先談到戰爭史研究，不可忽視最基礎的戰爭與戰役研究，然而當前因種種因素限制，歷史學者投入於枯燥戰役史的人不多。本工作坊中，有 4 篇文章重新思考戰爭與戰役研究的可能，十分難能可貴。首先從宏觀角度出發，國史館助修蘇聖雄報告〈蔣中正與華北戰役（1937）〉，探討抗戰爆發之際蔣中正的戰略考慮，特別是著重在「軸線轉移」與「以空間換取時間」等主張，後來也被認為是抗戰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於蘇聖雄提出的觀點，評論人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維開提醒，在軍事史研究、尤其是出身自軍事背景的研究者眼中，地理空間與戰略局勢考量有其基本知識基礎，作為歷史研

究者研讀戰略或戰史資料時，要多考慮軍事人員的思考方式，如此才有機會更深入理解相關文獻。

同樣關注於抗戰初期的戰爭局勢，湖南吉首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特聘教授王立本，選擇討論將領指揮局部戰役的作為。〈湯恩伯與平綏路東段會戰〉一文認為湯恩伯指揮長城南口的戰役有一定成效，確實遲滯日軍的行動，符合事前設定的目標，更指出以此戰役為例，未來應該參考更多史料，針對個別戰役的過程、決策者角色等各個問題有更深入的研究。確實目前戰爭史研究主要受到官方編修的戰史影響甚深，但隨著檔案、回憶錄等多元文獻的開放，對於諸多關鍵建議還有不少值得再考察的可能。與此相同的，國史館科員羅國儲所發表的〈沛然莫能禦：重探豫中會戰〉，也利用晚近出版的《徐永昌日記》、《胡宗南日記》等資料，重探 1944 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時雙方軍力規模、作戰安排等。過去普遍認為第一戰區作戰失利的主因之一是軍紀敗壞，但該文試著從不同角度檢討失敗原因。儘管作者企圖在戰史研究中超越以往軍事背景研究者之觀點，但整體來看，作為人文社會背景的研究者，如何在枯燥的戰略戰術文件、生澀的軍力武器性能資料中，找出具有特色的詮釋方式，仍有努力空間。

相較之下，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王文隆的嘗試顯得獨闢蹊徑。在〈抗戰時期西雙版納的中央軍〉中，他討論過去甚少注意的

軍隊組織與社會關係，以及該部隊作戰發揮之作用，特別是西雙版納地區扮演了中緬泰等地溝通的關鍵角色，是中國介入中南半島戰局的基地之一，誠如評論人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維真所言，此一研究牽動兩個中國、兩個法國，以及日本與英國關係，十分具有意義。值得注意的是，西雙版納中央軍扮演的地方武力中央化，以及中央武力地方化的雙重作用，可以做為戰後局勢乃至於 1950 年代以後駐緬國軍研究的基礎。所以從軍隊組織與地方政治、社會局勢變遷出發，能使人文歷史學者在戰爭與戰役研究中發揮更多力量。

如上所述，有關現代中國戰爭史研究，多半存在歷史學者與軍事學者不同的研究取向，這一點在傳統的戰爭與戰役史研究中尤為明顯。相較之下，伴隨戰爭出現的新科技、新知識運用，在歷史研究中往往引人注目。

二、戰爭與科技知識

在工作坊目前已發表的 16 篇論文中，有 4 篇討論新知識與新技術在戰爭中的作用，分別是政大歷史系博士生黃宇暘的〈1920-30 年代國府海軍水雷的試製與改進〉、檔案管理局研究員許峰源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對日軍在華細菌戰的肆應〉、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皮國立的〈「非常時期」（1937-1945）中醫涉入戰

爭與國難的相關論述〉，以及政大歷史系博士生楊善堯之〈抗戰時期的後勤兵站與傷兵運輸〉等文。

這些涉及戰爭新發展的研究，又大致可分為新武器的出現，以及戰爭與醫療等兩類，後者尤其是當前史學研究的前瞻課題之一。首先在與戰爭進行關係密切的新武器或作戰形態方面，黃宇暘從戰時水雷技術發展出發，討論施放戰術、生產機構等課題；許峰源則以檔案管理局檔案為基礎，討論戰時日軍在浙東實施細菌及生化作戰，以及國軍與地方政府合作防疫、引進國際專家協助的過程。新武器與作戰型態的出現，多半具有明顯的區域特徵，例如水雷主要用於江防及洞庭湖區，細菌生化作戰則集中於部分國軍與日軍拉鋸的湖南、浙江等地區，或許對戰爭全局影響有限；卻能看到戰爭的發展，促進或迫使交戰雙方在觀念、技術乃至組織等方面積極肆應的意義，亦為戰爭史研究不可忽視的地方。

其次，醫療史研究最近正方興未艾，戰爭也同樣推進醫療活動各種不同程度的演變。在皮國立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戰時中醫積極參與戰爭救護，成立中醫救護醫院、國醫救護隊等組織，從事戰場的醫療救援工作。當時中國眾多中醫師也響應政策號召，提出各種骨科、傷科療方，更通過中華製藥廠蒐集與整理各種藥方，在西式藥品缺乏的大後方發揮不小作用。戰爭之際有效的醫療與救護工作，對堅持長期作戰至為重要。楊善堯

在其對軍醫與後勤體系的研究中也指出，這些後勤保障是維持軍隊士氣的關鍵，而能在戰場上經救治存活下來的傷兵，更是不可多得的軍隊骨幹，所以不僅軍方制訂各級醫療後勤規範，社會各界也十分重視，呼應皮國立所言中醫界響應抗戰的情況。質言之，戰爭與醫療的關係固然是當前史學界研究熱點之一，但作為歷史研究者還必須思考相較於技術背景深厚的醫療專業人員，或許著力探討戰爭、醫療乃至社會時代等整體變遷，更能凸顯自身的優勢與特色。

戰爭推動科學、技術乃至社會轉變的作用無庸置疑，但過去往往流於各自分工、交流甚少的局面。前述新武器、新作戰型態的應用，與戰爭戰役發展有密切關係，通過長期密集的研討合作，能使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彼此借鑑參考。而戰爭與醫療固然是新穎的研究題材，然而背後依然與政治、制度等背景息息相關，放在歷史時空脈絡下觀察必然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三、戰爭與政治

戰爭與政治關係，向為歷史學研究者所長，其中尤以重要人物的研究最受矚目。關於戰時政治人物研究，近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王超然。在〈縱樂誤國？政治與私人娛樂的緊張關係（1934-1945）〉中，討論抗戰時期重慶地區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從各種名人口記中爬梳戰時政治上公領域與個人私

領域的衝突。文中也提到蔣中正提倡的郊遊踏青娛樂，在政府體系中反應十分冷淡，多半只是虛應故事。這些案例提供我們窺見戰時政治權力實質影響，若在重慶都是如此，那麼遠在豫中第一戰區又會是何種局面？

在戰局關鍵人物方面，北京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段鑫探討對戰前華北局勢至關重要的黃郛，在〈黃郛早年文獻的新發現及其思想主張再認識〉中重新檢視黃郛留日期間在《武學》雜誌中發表的10餘篇文章，藉此探討其政治與軍事主張的緣由。段鑫的研究集中於黃郛本身的主張變化，雖深入剖析個人，但較少論及其人際網絡與政局角色。相較之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趙席夔則利用日記材料，發表〈知識分子與政治威權領袖的關係：以蔣介石、胡適、雷震日記為探討〉。該文以自由派知識分子胡適與雷震為個案，探討知識人與政治領袖之間既緊張又合作的處境，也能看出國民政府如何將學界菁英納入體系中，並能進一步思考彼此間融洽或衝突，能反映何種競合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潘光哲評論時特別指出，人物研究必須注意當事者的變化複雜性，尤其在晚近眾多私領域史料不斷被發掘出來，這些性質的文獻，往往顯示與其他公領域史料相互矛盾的人物形象，因此從事政治與人物研究時必須思考這些或複雜、或矛盾的資料，探究其間隱含的更深層意義。

戰爭與政治關係除了人之外，另一個重要焦點是制度的調整。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

候選人陳佑慎〈憲政體制下的政軍關係——以國防部組織法的成形與立法爭議為例〉一文，討論戰爭與制度變遷的關係。戰後隨著中華民國行憲，國防部也隨之改組，成為戰爭事務主管機構；而經營該機構設立階段的法規紛爭、政治折衝等，也能看到憲政體制發展與國家轉型的各種課題。

誠如克勞塞維茲所言，戰爭是政治的延伸，從戰爭戰役的進展到新武器及新作戰型態出現，都能看到政治在其間扮演的角色，重要性不言可喻。而與政治相應的，社會與經濟環境在戰時的轉變，也是探討整體時代歷史重要面向。

四、戰爭與社會

戰爭與社會的關係，最具體展現是國家力量對社會資源的統制與掠奪。近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侯嘉星聚焦戰時東北地區的經驗，以〈農工並進：滿洲國時期的農業機器產業發展〉為題報告研究成果。該文談到日本與滿洲國當局，為了支持戰爭的需要，一方面實施農業資材管制；另一方面則提高農業機器利用，冀希增加農產。在此過程中，由日本移植的眾多農業機器工廠，成為東北地區工業發展的基礎之一。這也是自戰前「農村工業化」思潮發展的具體成果，成為總體戰中重要的拼圖；歷史研究在關注戰爭的毀滅與恐怖之際，也應該注意到戰爭所帶來的「遺產」。評論該文的近史所副研究員林志

宏指出，在關注戰時東北問題時，不能忽視日本國內在物資、勞動力等動員考量，由此或能作為探討戰爭與東亞國家社會關係的一個側面。

不僅日本當局重視總體戰下的資源控制，重慶國民政府也積極擴充經濟資源，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生許惠文〈四川省鄉鎮造產運動——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館藏農林部檔案為中心〉，提出希望利用農林部檔案考察 1940 年代以後鄉鎮一級的財政、經濟收益以及戰爭動員的課題。由此更值得思考的是，在整個大後方，政府控制力究竟能深入到哪一個層級？這不僅是社會經濟史的重要課題，也是政治史研究之一極佳個案。

事實上，此一課題涉及到的是當局在戰爭徵集人力物資與宣傳之成效，是社會動員重要目的。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張智瑋〈抗戰時期的戰爭宣傳與總動員立法〉，探討總動員工作與宣傳關係，評論人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君山特別指出，總動員立法上的拉鋸，或許反映政府部門之間不同立場之衝突，也透露了主政者、政黨人物及資本家之間複雜的關係，其間國家與社會力量互有消長值得注意，也應該關注重慶、南京乃至華北等地的宣傳與動員問題。與此類似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趙楚均以過去甚少的孔子紀念，在〈烽火中的聖人——抗戰期間各方面對孔子的紀念、爭奪與詮釋〉考察華北政務委員會、南京國民政

府及重慶政府如何紀念孔子節，從中看出對「正統」的競逐；此一工作也是戰時各方政權尋求正當性及強化宣傳的手段之一。

從戰爭與社會的關係，大抵能看到作為核心之政治、作為基礎社會經濟，與實際表現的戰爭戰役事件，彼此交織影響，構成複雜的時代圖像。作為人文歷史研究者的重要功夫，是思考如何將特定課題放到宏觀時代脈絡下加以理解，因此透過工作坊定期且頻繁的討論，能增進青年研究者對不同問題層面的認識，從而發展出更能觀照全局的歷史研究成果。

總而言之，運作一年來的「現代中國的戰爭、政治與外交」工作坊，基本上能達到對戰爭研究共同研討之目的，在成員共同努力下已展現初步成果。隨著討論激盪越形熱烈，彼此對戰爭與時代的整體認識更上層樓，這些累積也是未來研究道途中受用不盡的寶貴經驗。這樣的共同研習組織，假以時日或可發展為臺灣爭取兩岸乃至國際間二戰史研究話語權的重要平臺，其意義十分重要。